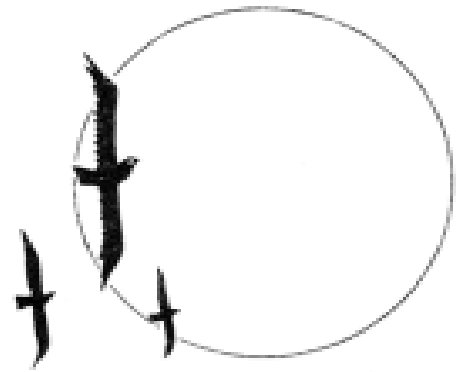


孙武军事思想

创洁 编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cntongbook.com

目　　录

孙武的思想.....1
民族智慧的基因.....1
地域文化的滋养.....5
军事世家的传承.....10
春秋争霸的时势.....15
战争硝烟的呼唤.....19
孙子兵法的创建.....22
“六艺”教育.....23
名师的传授点拨.....27
历史经验的思考.....30
诸子兵法的集纳.....37
一代兵圣智慧光芒.....45
审时度势选择“舞台”.....46
当机立断去齐奔吴.....49
静观待变引来知己.....51
龙韬虎略晓喻明君.....56
语动吴王拜将受命.....61
令行禁止杀姬树威.....68
战略妙算直指强楚.....74
攻其不备养邑告捷.....78
伐兵有术豫章诱敌.....83
“知战”而战救蔡伐楚.....89
以迂为直稳操胜券.....97
半济而击歼灭残兵.....102
妙用哀兵“死地”制胜.....106
“知足不辱”冷观胜局.....113

头脑清醒静对时世 116
诱敌深入再创辉煌 119
功成身退兵圣归隐 123
《孙子兵法》解读 129
审时度势庙算定策 130
上兵伐谋不战而胜 133
先计后战全胜至上 138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146
兵不血刃谋在反间 148
善战者求之于势 155
立于不败之地 160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 164
致人而不致于人 169
智将务食于敌 175
地之道也，将之至任 178
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 180
智者之虑杂于利害 186
无利而易敌者，心擒于人 192
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197
虚者实之实者虚之 204

孙武的思想

当我们沿着历史的长河追寻孙武的踪迹时可以发现：他埋首于中华大地，吸吮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华，铸造着自身阔深远的谋略根基；在波诡云谲的政治飓风前，孙武不逆“风”而行，因此他非但未损及分毫，反而借助乱世之“风”脱颖而出；战争的刀光剑影中，孙武在血与火的搏击里打锤着自己的豪杰本色，勇敢地响应着时代的呼唤。

风云时代，呼唤英雄；顺应环境，始有兵圣。孙武无疑是英雄，可他也只有在春秋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才能成为英雄。孙武有幸，他生逢乱世，顺应环境，并趁应时机成就兵圣美名！

民族智慧的基因

伟人的大仁大德、大智大勇并非与生俱来，他们所凭恃的根基也是脚下这块哺育万千生灵的土地和土地上万千生灵曾有过的智慧。孙武并非天生圣人，他所著就的《孙子兵法》也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的智慧之根也是扎于中华大地之内，他的成功人生也是吮吸中华民族智慧精华的结果。

中华民族发源于中原，然后向四周扩展，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炎黄子孙向来以自己的疆土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而自豪。然而几千年来，中国人面对的地理环境

实际上却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陆性环境。西北为帕米尔高原，山路崎岖，虽有一线可通，巨大而高寒干旱之区，在整个古代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西北地理极限。西南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而横断山脉阻隔着热带丛林瘴疠之区，越往古代越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往的障碍。北方地势起伏不大，为广漠无垠的草原与沙漠，人烟极稀。东面自黑龙江东部沿海直到东南沿海,有 2 万多公里的海岸。在先人们的心目中，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了“ 天下 ”。所以，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翻译成 “ 世界 ”。一个是 “ 天下 ”，另一个是 “ 四海之内 ”。

生息繁衍于这样一块位于亚热带的“ 天下 ”, 勤劳聪明的华夏祖先很早就知道以五谷为生。传说中的华夏祖先神农氏就是因发明农耕技术而得名的。“ 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吕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周书》)随着农耕技术的普遍推广，先人们逐渐懂得以土地为生存的根本基础，以农作物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从而使农耕文化得到充分的发育成长。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虽然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却未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以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仍然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土地是农业的根本，是华夏民族共同的生活基础，同时也是引起各氏族部落逐渐汇聚的主要因素。

在千年的文明历史上，中国远古文化具有多元区域性的特点。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先后分布有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区域；长江流域由下而上也先后存在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 · 松泽文化、良渚文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皂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等区域。虽然其他地区还有一些文化区域，如长城南北的燕辽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文化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华南文化区等等，但是无论从分布密度还是文明程度都不及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这两大区域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特别适于农业生产，因而不断吸引着散布于各地的氏族部落作向心性的迁徙。

在氏族社会，这种迁徙主要是以部落的分化或融合的方式进行的。为了争夺有利于维持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天然财富，部落内部分化出的不同势力群体之间常常发生械斗，部落之间更是频繁厮杀，于是招来了人类文明的助产士——战争，人们借助战争开疆拓土，征服异族，向“天下”之中渐进。

战争的频繁出现，成为加剧各氏族部落的分化和融合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致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三大集团，即西北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三大集团虽各据一方，却又彼此觊觎，不时进行大规模战争。

在距今 5000 年左右,三大氏族集团之间爆发了几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这就是华夏集团内部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炎帝、黄帝联合起来与东夷集团蚩尤的涿鹿之战。

战前，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豺虎”，从政治建设、军事训练、农业生产等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然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乃胜。不久，蚩尤率领所属 81 族，围攻黄帝族。黄帝族率领各附属部族，九战九不胜。后得玄女族帮助，

吹号角，击夔鼓，乘蚩尤族迷惑、震惊之际，冲破迷雾重围，击败蚩尤，终在冀中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将其擒杀。至此，黄帝族统一了黄河中下游两大集团。

这一系列大战，使过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逐渐演变成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的氏族联盟,即民族。

黄帝族统一黄河以北地区后，其首领轩辕氏自然成为华夏民族的共同领袖，最高军事长官。此后，战争的确“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频繁出现，越演越烈。从夏禹到周武，从齐桓到秦皇，无不是以这种“营生”开疆拓土，夺取天下的。

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战争由单纯攫取土地和财富演变为争夺政权乃至整个天下的主要途径。战争规模也随之而日益扩大。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商纣王的军队多达 17 万，周武王也有兵车 300 乘，虎贲 3000 人、甲士 45000 人，以及庸、卢、彭、濮、蜀、羌、微等八个方国的部落军队。双方交战时那种戈相拔、剑相及、人嚣马叫的壮观场面可想而见。这时，战争虽然越来越激烈，同时也越来越脆弱，比以往更加依赖于土地。战争的胜负既取决于双方智慧的较量和力量的拼搏，更取决于彼此物质基础的状况。人们要想赢得战争，必须充分利用土地，发展生产，积累财富，为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否则，战争就难以为继，难以取胜。

土地纷争引起战争，战争胜负依赖土地，土地开拓又依赖战争。社会历史如此往返循环，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华夏民族生活的主旋律。它不仅构造出一个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且孕育出融农耕文化和军事文化精华的制胜智慧。

在长期农耕劳动中，先民们不断探索日月运行和四

季变化的规律，努力掌握地理山川的特点及动植物生长的奥秘，以便战天斗地，从土地上得到丰富的生活资料。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著名的古代神话形象地说明，勤劳勇敢的华夏远祖们已经习惯于把人类的衣食住行与整个大自然的运动变化联系起来考虑。这种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中华民族逐步形成重整体、重综合、重宏观的独特视角，以及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这种独特视角和思维方法在农战合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引入军事领域，日渐产生出高度重视战争、长期准备战争、讲机变、重权谋的制胜智慧。这一切蕴藏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启迪众生的智慧，点悟人杰的心灵，导演出商汤伐桀、周武克殷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活剧。无疑，它也遗传到孙武的精神世界，激活这位伟人的聪明睿智和非凡才华，进而衍变为孕育《孙子兵法》的原始基因。

地域文化的滋养

伟代杰出思想家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既是他际会时代风云的产物，也是他本人所处的地域文化环境熏陶孕育的逻辑结果。俗话说：“人杰地灵。”齐国是一个社会政治环境开放，文化特质充满活力，特别是兵学传统悠久博大的国度。孙子生于斯，长于斯，不知不觉间，就从这片富饶肥沃的文化国土里汲取了丰富而充足的营养。可以说，正是齐国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一代兵圣——孙武，就恰如儒家宗师——孔子，只能诞生于周代礼乐文明充分保留的鲁国一样，这是历史的必然。

齐国的始祖是那位无饵钓鱼，愿者上钩的姜太公吕

尚，此人文韬武略，曾辅佐周文、武王讨灭商纣，功居群臣之首，被周武王尊称为“师尚父”。周武王灭商后，大封诸侯，“以藩屏国”，吕尚被封于东夷势力强大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东方，国号为齐。

吕尚就国后，在齐地所遇到的局面比较困难。经济上齐地很落后，人口稀少，土地贫瘠：“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汉书·地理志》)政治上极不稳定，东夷族与殷商有着很深的感情，敌视周族，甚至，东夷族的分支莱夷族还以武力阻止吕尚东进建国，而且吕尚又不是周室的同姓，一旦有重大事情不易像鲁国那样得到周室的全力支持。在这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吕尚毫不畏惧，再次施展其超人的智慧，采取了一系列高明有效的措施，来开拓局面，建国安邦。

第一，在民族关系上，对当地东夷、薄姑等族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软化其反抗立场，调合民族关系，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大局，这一点在开国之初，尤为重要。所谓“因其俗，简其礼”，它的实质就是不强制去推行周人的那一套“礼乐文明”，而是因袭、顺应东夷等人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吕尚的这一方针，为后代齐国统治者所遵循。它的长期实施，导致了“人民多归齐”的大好结果。当然，吕尚对于那些不肯顺从，甚至以武力进行反抗的，则是毫不手软，以牙还牙。比如，对莱夷族的反抗，吕尚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平息，避免引起恶劣的连锁反应。

第二，在经济上，针对齐地经济落后而自身具有某些优势的特点，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大兴工商，改造土壤，植桑养蚕，通渔盐之利。“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这一国策千余年中一直得

到了推行，使得齐国富国强兵：“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盐铁论·轻重》)同时，工商经济本身具有开放、进取的特点，这就为齐国文化注重实用、兼容并取特色的形成创造了契机。

第三，在政治上，吕尚主要采取了两条措施。第一条是用人政策，“举贤而尚功”。《汉书·地理志》记载，当年姜太公受封时，周公曾询问他如何治理齐国?太公的回答简单明了：“举贤而尚功。”就是在用人问题上采取不计出身，惟才是举，不重名分，以功为尚的政策。吕尚在齐国采取的这条开放的惟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比较客观公正地选拔了一批人才。这样，就使吕尚把他从西周带过来的人与本地人结合起来，打破了周人与当地人的界限，使他们抛弃前嫌，合作共事，共建家园。既发展了经济，又稳定了人心，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贤者云集，则事业兴旺。吕尚的这一方针自然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齐国很快兴盛发达起来。而位处泰山南麓鲁国的统治者伯禽奉行“尊尊而亲亲”的用人方针，这是一条闭关自守，任人惟亲的用人政策，使鲁国一直固守疆土，无所作为，夹于齐、楚之间，国力日衰。两相比较，吕尚的用人政策无疑高出一筹。“举贤而尚功”的方针后来也成为齐国的一条基本国策，它的推行，对于齐国开明政治环境的形成，各种学术思想的活跃，自然不无重大的意义。

另一条政策是礼法并用。《汉书·地理志》载：“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这表明在治国方法上，齐国不同于鲁国“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的做法，而是不拘泥于礼教，注重霸道与法术，造成礼

法结合，道法一体。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运用教育的手段，教育民众如何规范自己的行为，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以便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祛邪扶正，扬善惩恶，以法令治天下，确保教育的成果，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二者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这种重实效、尚时变的开放政治精神，对于思想的开放和兼容，杰出思想家的涌现并展现其才华，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中，齐地的文化以其独特的面貌出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为孙武及兵学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首先,齐国的社会环境铸就了齐地民众的独特资性。这就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齐俗宽缓阔达，而好议论”，使齐民众易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我们知道“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乃是中国古代兵学的一大传统，齐人“足智”尚谋的地域文化传统，对于兵学理论的构建，是一种文化上的推动。孙武长于齐国，这种地域文化精神势必会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另外，齐人“阔达”、“舒缓”这一国民心理，反映到学术上，就具有宽容精神。在与外界接触中，齐人容易接受新观念，新思想，并择善而从，加以必要的改造为己所用，发展丰富自己的主体文化。这一点反映在孙武的身上，就是他迁居吴国以后，同出身楚国贵族、深富韬略的伍子胥过从甚密，切磋学术，从而自己增加了对南方军事文化的理解，扩大了视野。

其次，齐国的社会环境导致齐国学术独具的特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产物，齐国顺应民俗、注重民生、讲求功利、并用礼法的社会大环境，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得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齐国文化具有注重实用和兼容博取的两大特点。齐国的实用之学相当发达，在数学、医学、植物生态学、土壤分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建树，在当时处于领先的地位。如《考工记》的作者是齐人，名医扁鹊也是齐人。这种实用之学的发展，对于兵学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兵学是一门实用之学，它不尚空谈，以现实利害为依据，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孙武强调用兵作战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思想，正是齐国这种讲求功利，注重实用特点在兵学领域的具体反映。所以孙武及其兵学的诞生，当与齐国注重实用的学术相一致。齐国学术的又一特色是兼容博采。齐国的学者善于将各家各派的思想融会而兼取，从而形成崭新的学术风貌。如管仲、晏婴的思想就兼有儒、道、法等多元思想的倾向。孙武之后的田桓公开始设立的“稷下学宫”则更充分地印证了这种现象。当时，田桓公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学者。到了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人才济济，竟达 1000 多人，共中还包括思想大师孟子和荀子这样的人物。这些学者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并展开学术辩驳和交流，整理典籍和文化。齐国的这种文化氛围对孙子兵学的诞生提供了适宜的温床。纵观《孙子兵法》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既充满了齐文化积极进取、注重实用理性的精神，又不乏南方文化特别是吴楚文化的阴柔辩证的特点。如孙武将“道”列为五事之首，强调从政治的高度考虑军事问题，显然是孔子代表的儒学思想的渗透；“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观，强调“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

则明显地留有早期法家思想的痕迹；至于全书所充满的朴素辩证思想，那可以说是老子学说影响的结果了。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毫无疑问，孙武之所以能够诞生于齐国，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齐国是一个军事大国，具有悠久深厚的兵学传统。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齐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坚实后盾。齐国自西周太公治齐到战国后期，始终是东方地区首屈一指的诸侯大国。这一局面之所以得以维持，实赖于齐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够在诸侯兼并，争霸斗争中战胜强国，日趋强盛。而军事强国的客观环境，则有力地推动着兵学传统在齐国的形成和发达。而这一切，恰好又让孙武赶上了。齐国是军事家诞生的摇篮，是兵学巨著的策源地，孙武长于这样的国度，绝顶聪明的他当然要抓住这个摇篮所给予他的一切机会，乘着尚武国风而直上青云。

军事世家的传承

适逢造就英雄的时代已是人生之幸，能生长于尚武重谋的军事强国更是幸中之幸，孙武两者都适逢其会，但最幸运的还在于他出生在一个声名显赫、家学深厚、将星辈出的军事世家。在教育和知识传播尚不迅捷的时代，家学无疑是使人成功的一个重要法码，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无可否认，将门家庭的背景对孙武的未来之路会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他受家庭的潜移默化，才得以走进军事学的神圣殿堂，从而铸就兵家性格，成为了一个纵横疆场、立马横刀、顶天立地的不

世奇雄。

孙子所出的田氏家族，是当时齐国新兴势力的政治代表，它顺应历史潮流，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对齐国完成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历史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样的家族对于孙武的诞生和其进步思想的形成，自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田氏家族也是具有兵学造诣的军事世家，这使得孙武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军事学熏陶，为其日后从事战争实践和开展军事理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提到田氏家族，不能不从田氏代齐说起。

田氏代齐是春秋战国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决定齐国社会形态变革的根本标志。它的发生并非偶然，乃是姜齐统治日趋腐朽，各种社会矛盾高度尖锐的必然产物。

春秋晚期，齐国统治者日益腐化、残暴，社会矛盾尖锐激化，这种情况在齐景公统治期间尤其突出。齐景公即位后“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当时的政治家晏婴批评他是“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史记·齐太公世家》)。老百姓劳动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府所盘剥劫掠，而刑罚之残酷，则使得市场上鞋子便宜而假足腾贵。残暴的统治造成“民人痛疾”、“民人苦病，夫妇皆诅”。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看到了姜齐统治日暮途穷这一事实,认为已经进入“末世”。其实这并不仅仅是齐景公等人的个人品德问题，主要是奴隶制走到尽头的必然结果。新兴势力田氏家族即充分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各种手段夺取政权。

田齐政权的祖先，是陈国的公子完。当年由于陈国公族的内部斗争，陈完被迫出走齐国，在齐桓公手下，

担任“工正”这一基层官职，在齐国留居下来，并以陈、田二字声近，而改姓田氏。

从此，田氏家族在齐国扎下了根，绵绵延续，枝盛叶茂。到了其四世孙无宇(桓子)时，已官至“上大夫”，他就是孙武的曾祖父。无宇生武子开，武子开生子乞，田乞事齐僖公为大夫。此人可不简单，他在借贷粮食给民众的过程中,采取让利于民的做法,“大斗出,小斗进”，以笼络人心。结果果然是“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挖了姜齐统治的很大一块墙脚。

田乞逝世后，他的儿子田常(田成子)按当时世卿世禄制度的惯例，继续担任齐国的要职，相齐简公。他把乃父的政治手腕学得出神入化，仍然“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争取到齐国民众的普遍支持：“齐人歌之曰：‘姬乎采邑，归乎田成子’。”这样就使得田常在激烈的宗族斗争中，不断取胜，并杀齐简公而立平公，自己担任国相。尔后，田常又把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平公只挂一个国君的空名。这样五年下来，齐国政权完全成了他的掌中玩物，那些曾经风云一时的大族如鲍、晏等势力被铲除得一干二净。田常还分割了自安平以东至琅邪的一大片土地作为自己的封邑,面积远远大于‘平公之所食”，实际上奠定了田氏最终代齐的基础。

田常去世后，子田襄子代立，继续相齐。他加快了代齐的步骤，让自己的同宗兄弟尽任齐国的都邑大夫，控制地方政权，并“与三晋通使”，争取外交支持。这样延续到他孙子田和之时，田氏家族终于“图穷匕首见”，推开傀儡，粉墨登场，把齐康公搬迁到遥远的黄海边上，留给他一座小小的城池作为食邑，“以奉其先祀”。至此

田氏代齐的步骤基本完成，封建制大厦在古老的齐国大地上矗立起来了。

虽然田氏代齐的关键步骤是在孙武身后发生的，且自其祖父(无宇的次子)田书(字子占)起，在受齐景公的赐封采邑的同时，又赐姓孙氏，使得孙氏在齐国与陈氏分开，另立新的宗族，然而这个进步的历史过程，对孙武兵学的形成依然是不无影响的。首先，由于孙武与田氏集团的渊源关系，田氏家族的兴衰对他来说仍是休戚相关的大事，他当然要站在田氏集团的一边，并在兵法著作中对这种进步倾向加以反映。其次，从《孙子兵法》以及佚文《吴问》等资料来看，我们的推论可以成立。他站在正确的立场预测晋国大族兴衰趋势，强调“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都和日后田乞、田常等人的所作所为有其精神上的一致之处。可见田氏家族的进步立场，对孙子兵学的形成并具有积极倾向不无关系。

田氏家族也是当时著名的军事世家。孙武的先人中不无韬略出众、战功显赫的人物。他的曾祖父陈无宇，以勇力事齐庄公，甚受庄公的宠信。后来在齐国内部陈、鲍与栾、高的家族斗争中，这位陈无宇曾率陈、鲍家族甲兵伏击对手，大败栾、高氏，并“分其室”，表现了突出的军事才能。

孙武的祖父田书，亦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名将，在齐国担任大夫一职。齐景公二十五年(前 523)，齐国军队征伐莒国，陈书尝参与其事，其间还独当一面执行作战任务，立有大功。《左传·昭公十九年》中曾生动载录了这场战斗的经过：田书出敌不意乘夜派军队缒登纪鄣城垣；及登上六十人而绳索中断，于是随机应变，让城上城下的官兵齐声鼓噪而虚张声势，莒共公不知虚实，丧

魂落魄，居然望风逃跑，齐军遂兵不血刃攻入城中。此役充分体现了田书临敌沉着冷静，善于出奇制胜的军事指挥才能。正因为田书在伐莒之役中立有重要功勋，齐景公才把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封赐给他，作为他的食采之邑，并赐姓孙氏，以表彰其卓著功勋。

略早于孙武的田穰苴也是田氏后裔、一代名将。他具有优秀的军事才能，被晏婴称誉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曾于公元前531年出任齐国将军，统率齐军抗击燕、晋联军对齐国的入侵，兵锋所指，锐不可挡，迫使燕、晋联军仓皇后撤。田穰苴率军乘胜追击，一举收复为燕、晋所侵占的齐地，因而被齐景公尊为大司马。故人们也称田穰苴为司马穰苴。司马穰苴治军严谨，执法公正，其辕门立表诛斩监军庄贾之事被传为治军史上的一段佳话，脍炙人口。司马穰苴在军事理论方面也造诣精深，颇有建树。他对古者《司马兵法》曾有过深刻的研究和阐述，是一位能够“申明”古者《司马兵法》的人，对古代兵学思想的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这种军事世家的传统即使在孙武身后也还在绵绵延续。例如孙膑，就可以视作为田氏家族(就大范围而言)在战国中期军事理论领域内的杰出传人。《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在军事领域的建树和齐、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的卓越表现，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但他在战国时期的出现并建功立业，却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肯定，孙武所出的田氏家族，实实在在是一个长期延续、极有作为的军事世家。

军事世家的优越条件，对于孙武的兵性铸就和《孙子兵法》的创作的意义不可低估。我们知道，家族内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